

“教而为人”

——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思想管锥

尹璐 于伟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附属小学, 长春 130024)

摘要: 儿童礼仪教育是伊拉斯谟教育哲学的核心理念。在教育对象和内容上,伊拉斯谟由上层社会儿童进而面向所有儿童,就儿童身体表现、服饰、餐桌等方面的礼仪进行了系统规范,展现出儿童性、生活性、社交性等特点。在教育逻辑上,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是基于独特的哲学逻辑基础之上的,即独特的“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的人性认知因果逻辑,身心一致论的行为逻辑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现实逻辑。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倡导了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赋予了儿童的身体和灵魂以新的时代价值内涵,促进了欧洲人礼仪行为举止的文明化和标准化,夯实了西方文明社会的根基。

关键词: 伊拉斯谟;礼仪教育;儿童;人性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18)03-0103-08

DOI: 10.14082/j.cnki.1673-1298.2018.03.011

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 1466?—1536)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教育领域内才华横溢、最具精神追求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著述等身,重新发现了儿童教育的价值,并以礼仪教育(civilitate)为核心,系统阐释了以教育实现社会改造的宏伟理想,提出了“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At Homines, Non Nascuntur, Sed Finguntur)”^①[1]304的儿童礼仪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欧洲人文明化和礼仪规范的标准化,是体现欧洲教育一体化的代表性人物,这也是当代欧洲著名教育合作和交流计划以伊拉斯谟之名进行命名的原因之一。^② 本文试图就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思想的内容、理论预设、思想张力与限度等

作一阐释,以管窥其儿童礼仪教育思想的特质。

一、伊拉斯谟独具特色的儿童礼仪教育

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家有关礼仪作品中最为精致的产物之一。他面向社会需要,详细整理了儿童在私人、公共社交场合最为重要的注意事项与礼仪建议,并取得了广泛成功,呈现出独特面貌。

伊拉斯谟将礼仪教育的主要对象定位于儿童,重新发现了儿童和儿童教育的价值。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主义者,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卡斯廷利欧(Castiglione)、卡萨(Casa)等都鼓励人们学习良好的礼仪,包括交谈、餐桌礼仪、穿衣、坐姿、个

收稿日期:2018-04-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三五”规划2016年课题“率性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课题批准号:FHB1605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尹璐(1982—),女,吉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儿童教育史研究,E-mail:yinl82@163.com;于伟(1963—),男,河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基础教育理论研究。

① 拉丁文为“*At Homines, Non Nascuntur, Sed Finguntur*”,见 S. Dresden, et al. eds., *Opera Omnia*, Vol. 2,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 31; 英译为“*Man Certainly is not Born, but Made Man*”。本文结合伊拉斯谟对教育功能及其教育与人的塑造关系的强调,将之意译为“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

② 这一项目即欧共体于1987年推行的致力于欧洲教育合作与交流的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Program),以及欧盟于2004年实施的伊拉斯谟—曼德斯计划(Erasmus Mundus Program, 又称伊拉斯谟世界项目)。

人卫生等行为规范。但这类作品几乎都是针对贵族生活启蒙教育的,伊拉斯谟是为数不多的儿童礼仪教育的倡导者。伊拉斯谟改变了以往这类作品所针对的主要对象,转向了自罗马晚期以来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儿童。他的几部主要教育作品都是针对儿童的,扉页题词上明确指出是献给几位儿童的:《论儿童的博雅教育》(*De Pueris Statim ac Liberaliter Instituendis Declamatio*)一书是为克利夫斯公爵(Duke of Cleves)之子13岁的威廉(William)所作,《论儿童的礼仪》(*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是为伊拉斯谟的赞助人费勒亲王(Prince of Veere)之子、11岁的勃艮第王子亨利(Henry of Burgundy)所写,《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实际上也只是写给哈布斯堡家族时年16岁的查理王子的。同时,拉丁文中,儿童一词的基础词汇是 *puer*,伊拉斯谟作品中使用的 *pueris*、*puerilium* 都是 *puer* 的衍生词,指代儿童,孩子。根据罗马社会以来西方人对儿童履行社会职能的认知,童年往往被认为是“在14岁或17岁时结束”^[2]。

当然,伊拉斯谟儿童教育作品的主要教育对象并非平民阶层。他在《论儿童的博雅教育》的献词中明确写道:“我之所以将这部作品献给您,是因为其中所讨论的教育方法特别适合于领导者的孩子们。他们比其他孩子更需要一个完善教育……”^{[1]296} 由此可见,王公贵族、高级教士、都市富裕阶层在内的社会中上层家庭中的未来精英才是伊拉斯谟针对的主要对象。伊拉斯谟实际上借用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鲁塔克等人白板或白纸作画、蜡块、陶器塑形等比喻来说明他为何以儿童为教育对象。^[3]之所以面向精英阶层儿童,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从教育对象上来看,儿童还未被复杂的人类社会所腐蚀,正适合被社会施以价值引导,学习这些呈现了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等极强公意性价值的行为举止,进而形成儿童群体的价值认同和社会认同。从教育投资能力上看,15、16世纪西欧社会贫富悬殊,让儿童将时间消耗在教育学习之上无疑会造成许多普通家庭劳动力的损失,因此,能够将大量金钱投资在儿童教育上的家庭并不多。况且,伊拉斯谟教育理想中所需的书籍、教师、适宜陶冶孩子品位的高雅环境场所以及其他教育费用,都需要不菲的金钱方能支撑。从伊拉斯谟个人理念来看,他并未完全超越时代局限。他尊重且支持既有社会等级秩序,相信上层之人最能

体现美德之真义,是一个国家文明或野蛮的关键,并将社会改革的理想寄托于他们身上。此外,伊拉斯谟非身家丰厚之人,出于个人谋生、仕途和职业发展需要,多须奔走于教俗贵族、富商豪门等恩主之间,因此,在阐述自身教育理想之时,也不得不有所现实考量。

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基于身体规范的礼仪教育,具有社交性和生活性特点。伊拉斯谟的礼仪教育主要分为身体、服饰、饮宴礼仪、卧室举止等几部分内容,其中身体语言及其社会规范是伊拉斯谟阐述的核心内容。伊拉斯谟隐晦地指出,人的身体具有能指和所指双重意涵。能指即身体的自然属性。伊拉斯谟极为关注人身体的各种表现,如眼睛的转动、面部表情、呼吸、坐姿、站姿、打喷嚏、咳嗽、呕吐以及“身体的身体”(body's body)^{[4]278}——服饰等。伊拉斯谟深信这些良好的身体行为模式如能在幼年时期建立必将永远伴随孩子健康成长。^{[1]318}因此,伊拉斯谟不厌其烦地引导儿童认识身体、控制身体、运用身体。例如,他在《对话集》(*Colloquia*)中指出:“无论何时,长辈召唤你的时候,你都要挺直站立、脱帽。你的脸不能看起来悲苦、愁闷,也不能鲁莽、无礼、多变,要用令人愉悦的谦逊来控制自己。你要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交谈对象,你的双脚要并拢、手要放直……你的衣服要干净……。”^{[5]20}

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追求的生活也是一种品性与品位之道。他一再将优雅、合宜发挥到极致。如,服饰的穿着既要有品位,凸显优雅气质和品性,又要干净、整洁,令人愉悦,整齐协调,剪裁得当,契合于身体曲线;要因俗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要合乎身份、地位与等级,又不致于过于引人注目。^{[4]278-286}而在饮宴礼仪方面,入座前,要修剪指甲、洗手、放松腰带;进食时,勿挑剔食物、反刍等,要顾及他人感受,以免使同桌之人感到尴尬、难以忍受。^{[4]281-286}他还列举了数种坏品位,如服饰上“拥有无用之物”,“开叉”,“绣花且色彩斑斓”,男性“拖着长下摆或拖裙”,等等。^{[4]279}

雅斯贝尔斯(Jaspers)指出,真正的教育是人与人主体之间的交流活动,是知识的传授,是生命内涵的领悟,是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传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长,并启迪其自由天性。^[6]伊拉斯谟所针对的正是儿童在日常社交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他认为,虽然贵族拥有更大的特权,

但其行为举止未必比普通人更好。因此,伊拉斯谟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在儿童礼仪教育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人人有效的行为方式。这是建立社会统一性的基础,是进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的必要前提。因此,真正的礼仪教育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近。这也就意味着要限制所有个体人的特殊行为,而仅适用那些被大多数人承认和接受的行为方式。德国学者埃利亚斯(Elias)也认为,这就是文明化的过程,意味着人开始懂得以规范约束自身欲望、冲动,自觉追求有教养的生活言行,成为文明人。^{[7]114,121-130}

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的目标是通过基于儿童身体的礼仪指导,重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观,进而形塑新的社会秩序。身体的表现可以透视出某一群体或个人在某一时代的政治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礼仪风尚、审美情趣等社会属性。从古希腊开始,身体即被视为一种政治权力的雄辩术,身体礼仪被用以提供某种社会规范化理想。一方面,政治规范身体,政治秩序会对吃、穿、住、用、交往、劳动等各项事务进行指导和禁止。另一方面,身体可以为群体或个人提供作为特定团体、种类成员的习惯、身份意识。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社会流动加快,许多人被迫要适应和其他人相处的新社会行为方式。故而,身体边界日益受到整顿,身体控制和情绪控制变得越来越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精英领导阶层日渐认识到,人的社会行为举止必须符合经由教育而获得的严苛规则、纪律,这种认知日益上升为他们的统治理念。由此,各种身体行为的指导手册被制造出来以便辅助对身体行为的管理。对人文主义者而言,涵盖身体行为在内的礼仪规范是社会等级的话语,是为了规范上下尊卑关系,合宜的行为举止也正是区别上下阶层、高贵与野蛮的差异所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IL Principe*)、卡斯廷利欧的《廷臣论》(*IL Libro del Cortegiano*)等书籍的目的即在于此。埃利亚斯认为,在这一时期“欧洲的上等阶层曾以‘礼貌’与‘有教养的’这两个概念来展现自身行为的优越性和特殊性,在普通的、未受过教育的阶层面前表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和与他者的区隔。”^{[7]103}伊拉斯

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阐释西方传统的身体政治观念的产物,是为了迎合时代需要所写下的促进儿童社会化、规范化的产物,“以便让你整体的穿着、说话、姿势、体态表达出你真诚的谦卑与可敬的本质。”^{[5]20}

总之,从整体上看,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是基于儿童身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教育,是重塑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的文明特性的尝试,对文艺复兴时期文明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思想的理论预设

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思想既显现了16世纪西方社会追求文明的心理,又凸显了其儿童教育的基本理论预设。

儿童礼仪教育是基于伊拉斯谟对人性认知的因果预设逻辑之上的,即人并非生而为人,人性具有未完成性、可塑性,受环境影响,教而为人。儿童是否可教?如何教育?儿童教育研究的出发点离不开对人性预设的讨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西方观点都认为儿童是可教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人类对人的尊贵和优越有着清晰认知,无论是古希腊神人同形共性的宗教观,还是德尔菲神庙石碑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都昭示人类对自身地位及其主观认识能力重要性的认识。^[8]而在中世纪时期,人的地位与价值折损于亚当、夏娃的堕落及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人的尊贵让位于神的至高无上,人性恶及其永无止境的悲惨后果、神的旨意和最终救赎成为西方人思考的主题。由此,人类的天赋能力成为上帝的神恩赐予,“先信仰,后理解”(fides praecedens, intellectum sequens)^①成为基督教认知论的出发点。而文艺复兴的价值之一即是重新发现人的尊贵和价值。在人性的重新阐释上,伊拉斯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伊拉斯谟明确指出,“人并非生而为人,教而为人。”^{[1]304}他从自然界的诸多现象而非宗教出发,充分肯定了人性中存在的善及人的可教性,探讨了教育功用,肯定了人在不同环境下选择的自由和人学习的能力。人具有未完成性、可塑

^① 上帝的信仰(fides)与理解(intellectum)是中世纪奥古斯丁(Augustine)、安瑟伦(Anselmus)等基督教哲学家探究的哲学核心问题之一。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自明性的,只需信仰;安瑟伦提出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除非信仰,否则无法理解。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意]安瑟伦著,溥林译:《信仰寻求理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性的人性论也构成了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的哲学基础。

伊拉斯谟指出,人并非生而为人。漫游在荒山野岭之中,生活在毫无法规世界之中的人类只是原始野生动物,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人若没有接受过哲学或任何一门许可的训练,只是比粗野的动物更低下的生物。动物只要跟随天性而行,人除非接受过哲学或知识的影响,否则将比野兽更糟的受到动物的摆布。”^{[1]304-305}同时,自然界的禽兽昆虫往往一出生就天生具有某种强大的独立求生优势,或会飞能游、会跳能跑,或拥有快速移动的腿或翅膀,敏锐的眼睛,健壮的身体,覆盖全身的皮毛,锋利的爪牙,这些优势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捕猎食物和养育幼儿。^{[1]301}而人的生命历程之初,却存在天然的生命缺陷,孱弱、无蔽、无抵抗力。在本能的动物世界中,人类居于明显的生存竞争劣势。如果按照达尔文的丛林法则,人类无疑会被自然淘汰。

那么,又是什么让人能够最终脱离纯粹的生物性,发展为真正的人呢?伊拉斯谟对“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解答。伊拉斯谟指出,人“教而为人”。“自然,万物之母,她赋予野兽较多本能去完成其物种所特有的功能,却独独给了人类理性,所以她把人类成长的重担放在教育上。她给了人类一个具备知识的头脑。”^{[1]301}虽然人和动物具有明显差别,官能能力不同,但在认识、学习能力上,人具有明显优势。人真正的天性就是依理性而活,理性是自然之母对于人类天然缺陷的一种弥补。伊拉斯谟对人性的基本态度是乐观的。他认为人内在灵魂真善美的种子就根植于人的天性之中。“人生快乐的首要条件是天性,所谓天性,即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及善念。”^{[1]311}那么,人类也就拥有了对人类本性加以导引的可能性。通过人类自身的智能活动——教育,人类足以弥补自然的生命缺陷,教育的本质蕴含了人类成就的可能性。而且,无教育不成人,只有良好而正确的教育,方能使人的人性光芒绽放,以理性为指引,择善而行,才能超脱于动物的自然本能需要;只有增强人性中的善与理性,促使人们追求内在灵魂的提升,才能使人获得幸福而正直的生活。换言之,这种教育的重点是传统的德性伦理,即在天性的基础上发挥具体的道德。这是教育的功能、也是教育的首要目的。

在人性论方面,伊拉斯谟更像是一位环境论者

而非纯粹意义上的性善论者。这构成了伊拉斯谟人性论的另一维度。“你不可能永远保有儿童的纯朴和天真,如果你不去陶冶儿童的灵魂,使其成为真正的人,灵魂就会自己堕落为一头残忍的野兽……自然赋予小孩子特殊的模仿能力,而孩子模仿恶的冲动更甚于模仿善的冲动。”^{[1]306-309}在此意义上,伊拉斯谟一反中世纪人性恶论和宿命论的主导论调,意识到人性是复杂的,人的种种表现很难用非善即恶的简单标准予以清晰划分,人的发展存在走向善或恶的多种发展可能性,可能因各种原因沾染邪恶走向罪恶之路,也可能因善意善行而走向高尚人生。换言之,对伊拉斯谟而言,人的本性具有未完成性和可塑性的特点,人人具有巨大潜能。人性的走向,关键在于引导。唯有透过教育使人脱离兽性,方能使人懂得辨别善恶是非与高低良莠,成为真正的人。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才具有了存在价值。

儿童礼仪教育是伊拉斯谟身心和谐一致论的应然和行动逻辑。伊拉斯谟关于灵魂与身体关系的人性论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他的人性论受到《圣经》影响,脱胎于基督教神学和人性论。培养“宗教人”的教育传统长期支配西方教育界,往往特别强调人是上帝的摹本、人的原罪等,而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通过人对上帝的信仰、赞颂与服从,使人的不完善得以完美。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学者相信人类的灵魂就是人类尊贵和价值的根本,也是基督教神学的支柱,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与神性相一致的人性,使人成为充分成型、完美之人。^[9]伊拉斯谟并没有全盘接受基督教关于身体与灵魂的主流观点,即身体与灵魂两分且对立。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只不过是一次堕落的偶然结果,从此灵魂被关在肉体监狱之中的传统论断,开辟了灵魂与身体有机结合的一条新理路。

伊拉斯谟认为,宇宙由三个层次分明的世界构成,分别是智识的、不可见的天国世界(intelligible and invisible world),这是上帝与天使居住的精神世界,这也是永存的真理和终极的追求,由上帝的心灵力量统领一切;可见的世界(visible world),这是主要以太阳为最高地位星体、其他星体及一切受造物所组成的物质世界;人的世界(man world),它位居两个世界之间。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同时参与了另两个世界,即以灵魂进入不可见世界,精神世界由人的灵魂彰显,或以人的身体参与、表现可见的物质

世界。^{[10]65-66} 由此,人也被伊拉斯谟分成相对应的、高低不同的灵(spiritus)、魂(anima)、体(corpus)等三个部分。伊拉斯谟指出:“灵使我们为神,体使我们为兽,魂则使我们为人;……灵将我们提升到天国,体将我们拉向地狱,魂则与此无涉。”^{[10]52} 可以说,伊拉斯谟点明了人的高贵所在,并赋予人生新目标,即选择最高等的、最具道德与知识的生命形态。换句话说,人之所以是优越的,就在于它具有选择自由。正因为人类在自然世界中没有明显而固定的特质和位置,因此人类才具有了所有可能性,可以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去决定他在宇宙间的位置。

同时,伊拉斯谟也注意到当时社会存在的身体与灵魂重视程度的不均衡性。但他并不忽视身体的健康和仪态,不认为服装、食物、仪式等外在的事物与身体有关,反而是将身体视之为灵魂的工具,灵魂的意念与力量必须通过身体来表现,就如同工匠要有精巧的工具才能展现精湛的手艺。伊拉斯谟相信,人不只是一个灵魂,而是一个带着身体的灵魂,身体是灵魂的外衣和居所,灵魂与身体紧密相连且相互影响,灵魂会因为身体状况而发生改变,灵魂的高贵也会借由美丽的外表展现出来,灵魂意志决定人的言行举止。^[11] 而他希望身体与灵魂相称而美,一个美丽的身体,代表着拥有一颗美丽的心,就如同一头高大强壮的马(身体)由一位英姿勃发的骑士(灵魂)执缰,相得益彰。^[12] 总而言之,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是有机的互动,相辅相成。外在的言行举止与宗教的虔诚追求和道德的提升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外在的行为可以彰显内在品格和教养,儿童礼仪教育也就成为伊拉斯谟追求宗教虔诚和道德提升的重要举措。这也是他为何在儿童礼仪教育中一再强调内在灵魂要与外在举止成就相映之美的原因。

三、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的张力与限度

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在许多方面是极具张力的,但又限于各种原因,一些主张很难实现。

伊拉斯谟的礼仪教育对象突破了统治阶层儿童,拓展到所有儿童,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无国界的儿童教育全民共享论。伊拉斯谟的书籍公认为是献给“有着光明前景的儿童”(criança muito promissora)的。^{[13]174} 事实上,他的儿童礼仪教育是建立在两个

清晰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即良好的行为是可以传教的,且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他说,“出身高贵之人没有掌握和他们高贵血统相适应的举止是可耻的。那些命运使他们成为粗俗、低贱之人,甚至农民应更加努力地通过优良的举止来弥补命运不公所带来的一切不平。无人可以选择他的国家或父亲,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自己获得培养美德和良好的举止。”^{[4]289} 他还建议勃艮第王子亨利这位贵族要将名义上写给他的著作赠送给所有想要学习的儿童,以巩固他们的友谊,促进他们努力学习,养成良好的举止。在《论儿童的博雅教育》中,伊拉斯谟也指出:“市民的儿子难道不应该和君主的儿子得到一样多的爱吗?一个人的地位越是卑贱,他越需要人文教育的依靠,以使自己从低下的地位中提升。”^{[1]334} 所以说,他所主张的教育更具有普遍性意义,超越各个国家教育的边界,倡导全欧洲的共同课程,且教育可以为所有人共享。对此,茨威格(Zweig)也指出,伊拉斯谟的目标是将来自一切国家、一切种族、一切阶层的所有心地善良的人结合成一个有教养者的大联盟。^[14]

伊拉斯谟是当时教育界学术权威之一,他的教育倾向无疑展现出权威的先导作用,引领着时代进步。伊拉斯谟系统阐释了礼仪教育的内容,也奠定了以后三个多世纪里关于此类礼仪文学作品的基调。他的作品《论儿童的礼仪》几乎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家庭教育儿童规范的参考书。这本书于1530年在巴塞尔以拉丁文出版,很快在巴黎、安特卫普、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地重印,各种译本、改编本、节选本层出不穷,如1531年的德文本,1532年的英语—拉丁双语版,1537年的法文本和捷克语本,1546年荷兰语版等至少80种版本和14种译本。^{[13]176[15]} 后世教育者大都接受了将礼仪教育作为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英国教育家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1490—1546)为培育优秀统治者而写作的《统治者之书》(*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采用了许多伊拉斯谟提倡的礼仪教育手段、早教,等等。因此,有学者指出,埃利奥特是伊拉斯谟在英国的诠释者。^[16] 洛克(Locke)也极为重视礼仪的价值与作用,将之视为完美道德的外在表现,视之为其倡导的英国绅士教育及绅士品格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礼仪是在一切美德之上所加的光环,绅士们的声音、言行举止、容貌、姿态等外在表现都要优雅,以便能够获得他人好评和尊重,让他人感到舒

适和愉悦。^[17]在儿童礼仪教育领域,整个16世纪的德国、荷兰、英国等地的学校课程几乎都详细地规定了儿童礼仪课,17世纪的荷兰甚至将之规定为必修课。伊拉斯谟的主张延续了三个多世纪,在伊拉斯谟的巨大影响下,礼仪课程成为欧洲西、北部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都是伊拉斯谟观点的翻版,直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校的主要课本之一仍是《论儿童的礼仪》。^{[13]156-158}从中可见伊拉斯谟具有的独特文化魅力,借用其好友、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的话来说,“伊拉斯谟之名永垂不朽”(Nomen Erasmi Nunquam Peribit)^[18]。

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儿童教育行为,即以操控儿童外在行为塑造人的内心,进而身魂合一、内外合一。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的主张在许多方面保持了古典、中世纪的传统和特征,如古典教育对言传身教的重视、对道德的强调;骑士教育对身体的重视、等级秩序观念、餐桌礼仪禁忌等在这本书中重又出现。同时,它又包含了一些新规则的萌芽,如人的行为的可教、可控性,尤其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个人内外在关系的隐晦表达。

更为重要的是,就伊拉斯谟个人理念而言,礼仪教育是为了达到灵魂与身体的和谐统一。伊拉斯谟认为可以根据人身体的各部分,如眼睛、呼吸、坐姿、站姿等各种标志充分反映出人的内在,洞察人最为深处的秘密。如果行为举止可以暴露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那么就可能通过控制这些可见的外在行为举止来影响和矫正人的心灵,达成内外合一,知行合一,这也是他的身体、礼仪训练的重心和目的所在。由此,一种新的儿童教育形式在伊拉斯谟笔下产生,即通过宣扬哪些行为是恰当的,哪些行为是罪恶和不恰当的,从而将儿童的内心世界视为一种可操作之物,以巧妙手段进行教育培养,使儿童放弃一切过度行为。它打破了欧洲自奥古斯丁以来长期认为儿童身体脆弱、性情天真、无善恶之分、对社会并没有太大价值的观念^[19],重新赋予了儿童、儿童教育以新的时代价值内涵。一方面,这种教育形式向儿童讲授良好的身体行为规范,以及成长所带来的社会责任,从而吸引儿童注意身体和社会两方面,这在儿童史上还是第一次。另一方面,通过身体以及身体的规训这一着眼点,伊拉斯谟将时常在历史中

缺失的儿童纳入到历史情境中,而身体在漫长的教育史中,首次不被看作惩罚的对象,而是被用作教育的工具,从而丰富了教育活动。

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思想促成了欧洲新的文明观念的形成。伊拉斯谟以拉丁文的“礼仪”(civilitate)为题撰写儿童礼仪教育的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词语逐渐演化出西方各国相关词汇,如法文的civilitéé,英文的civility,意大利文的civiltà,并进而转化为具有特定学术意义的“文明”(civilisation)一词,取代了中古传统的“宫廷”(courtoisie)一词。随着这些新礼仪的教育实践,欧洲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观念,这种观念“将封建骑士的礼仪挤到了次要地位,展现出一种文明过渡性特征”^{[7]143},既用来表明有礼貌、有教养的行为举止,也用来描述井然有序的社会,体现出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并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观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学者基佐(Guizot)指出:“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它是国民生活的不断完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20]换句话说,文明的两大基本要素:一个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进步;另一个则是个人内心生活的发展,即人性的进步。

整体来看,伊拉斯谟的某些主张也有着自身局限,是不完善、模糊的,是当时大多数人难以达到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也注定了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理想的某种悲剧性。一方面,令伊拉斯谟没有想到的是,他重视外在表现,只不过试图以之反观个人内在的高尚品德和丰富的知识内涵,真正实现内在道德和外在言行的合一,展现一位应然的理想人的基本素质。^[21]然而,实然并非如此。随着社会等级划分的改变和更加严格的整理,儿童礼仪教育的某些原则被修改,人们更为关注社会身份问题和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适当距离。由此,对外在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或异化了。它成为一般人对绅士、淑女外在风范的讲究,凌驾了对内在本质的要求,而在一些君主、贵族阶层之人那里,对外在形式的过分看重,尤其奢侈、华美服饰的需求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为展现自身身份地位,维护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18世纪后,伊拉斯谟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的儿童礼仪行为实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礼仪课本采用教义问答方式,强调儿童死记硬背而

不顾儿童实际体验。不久后,儿童学习控制自身行为的礼仪教育完全在学校里进行,并日益成为庞大教育过程的一部分,通过重复读写、遵守教室内的相互监督而学习、践行举止规范,将原本并不属于自身的规范内化为儿童自身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从而使这种主动创造社会生活的行为让位于强制的遵从。儿童礼仪教育日益因为对儿童的主体性和本体性需求的忽视和本末倒置,偏离了儿童自然成长的轨迹,而沦为对儿童施以的过度束缚和枷锁,湮没了儿童的创造性和激情。

伊拉斯谟对行为表现的教育的关注,逐渐像福柯(Foucault)所说的那样,在后世被异化为权力运作下的规训教育,即通过层层的高密度监视、检训、反复操练和强化,确保个体服从纪律,并以细致、明确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对不同行为表现者给予区别对待,实现外界惩罚、矫正与内在自我教育、审查功能的结合。^[22]吊诡的是,人类追求文明的本意之一是更大限度追寻自由和人性的进步,但建立文明的过程中却又限制了自由、压抑了人性。伊拉斯谟的主张也在另一层维度上被异化并印证了近现代西方文明实质上就是一部分人在理性、秩序等幌子下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这一经典论断。^[23]本意是展现天性的教育理想异化为教育即规训的现实,不能不说是伊拉斯谟教育理想的一种恶意和讽刺。

此外,他对教学场所等缺乏明确说明,在教育作品中不时批评当时公共学校的各种恶劣情况。这也让他处于教育理想和现实境遇的矛盾之中而无法调和。而伊拉斯谟倡导的儿童礼仪教育,无论世俗还是宗教的,却日益成为学校的职责,而他个人却偏爱家庭教育,如此一来,他所提出的团体竞争、在游戏中学习等教学方法也无从实现,且只有上层社会才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承担私人教师的费用,这也与他全民教育的理想相去甚远。

总之,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思想承继于前人智慧,也得益于他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对自身体验的融入,形成了他成体系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儿童心理学认知。他总结道,要首先要在儿童稚嫩的心灵中栽种下虔诚的种子,灌输他们对博雅知识的喜爱,教予他们人生责任,并在幼年时期训练他们良好的礼仪规范。^{[4]273}在伊拉斯谟的作品中,他关注的并非古典作品中深奥、无味的哲学思辨,而是像西塞罗、普鲁塔克、昆体良等人条理简明、论证清晰、具体

而实际的学说,他喜好的是能够让心灵远离错误和邪恶的主张。因而,他的儿童教育思想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教而为人,以清晰实用的基于身体的礼仪教育等教育手段习得为人处世的规矩,达成文明精神、净化宗教、和谐社会、稳定政治的目的。

伊拉斯谟儿童礼仪教育思想也启迪后世。他的主张奠定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儿童地位和儿童教育重要性稳步提升的基础,深刻折射出社会精英对社会秩序的要求,形成了可供政治家使用的意识形态资源。同时,身体也创造了文化,他通过向儿童教导关于自身身体之种种而生成文化骨架,并由此全面呈现这一时期关于人格的教育思想和当时社会文化的流向,从而在儿童思维深处植下了有礼貌、有教养的社会和自我意识的种子,进而将其发展成为儿童未来的主体品质,夯实了西方文明社会的根基,成为后几个世纪的作家援引的儿童礼仪教育权威,促进了欧洲人礼仪行为举止的文明化和标准化。伊拉斯谟的儿童礼仪教育构成了欧洲儿童教育思想史中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 [1] ERASMUS, DESIDERIUS. A Declamation on the Subject of Early Liber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M]// Sowards, J.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6).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 [2] 艾格勒·贝奇,多米尼克·朱利亚. 西方儿童史(上卷) [C]. 申华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4.
- [3] WOODWARD, WILLIAM. Desiderius Erasmus Concerning the Aim and Method of Edu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4: 80.
- [4] ERASMUS, DESIDERIUS. On Good Manners for Boys [M]// Sowards, J.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5).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 [5] THOMSON, C. The Colloquies of Erasmus [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 [6]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 [M]. 邹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4.
- [7]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 [M]. 王佩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8] RUSSELL, BERTR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2: 85-86.
- [9] 雅各布·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M]. 何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0-135.
- [10] ERASMUS, DESIDERIUS. The Handbook of the Ch-

- ristian Soldier[M]// O'Malley, J.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66).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 [11] ERASMUS, DESIDERIUS. *The Colloquies* [M]// Thompson, C.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39).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595-604.
- [12] ERASMUS, DESIDERIUS. *Oration On the Pursuit of Virtue* [M]// Fantham, Elaine ed.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Vol. 29).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6.
- [13] ARIÉS, PHILIPPE & DUBY, GEORGES. *Historia de la vida Privada* (Vol. 3) [C].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09.
- [14] 斯蒂芬·茨威格.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M]. 舒昌善,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4.
- [15] RUMMEL, E. *The Erasmus Reader* [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101.
- [16] WOODWARD, WILLAM.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400-160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275.
- [17] JOHN LOCK.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0-152
- [18] ALLEN, P. *Opus Epistolarum Des. Erasmi Roterodami* [C].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8.
- [19] ST. AUGUSTINE.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M]. Trans. by Albert Out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2; 8-10, 18-19.
- [20] 基佐. 欧洲文明史[M]. 程洪逵,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4-7.
- [21] BRYSON, ANNA.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5-81.
- [2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1; 177-184.
- [23]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Madnes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535-538.

“At Homines, Non Nascuntur, Sed Finguntur”: Erasmus’ Philosophy of Manner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YIN Lu, YU Wei

(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rimary School Attached to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Manners Education is the core idea of Erasmu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Regarding education objects and content, Erasmus aimed at the children from upper class to all children, and presented systematically guide to the manners of all children’s of body, clothing, dining, etc.,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children, being daily and social. As for education logic, Erasmus’ manners educational ideology is based on the unique philosophy logic, namely, the causal logic of knowledge on human nature, that is “At Homines, Non Nascuntur, Sed Finguntur” (“Man Certainly is not Born, but Made Man”), the behavior logic of body-mind consistent theory, and the realistic logic of the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etc. Erasmus’ manner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dvocated a new way for education, and gave the children’s body and soul a value of new era. Erasmus’ works promoted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anners, and strengthened the foundatio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rasmus; manners education; children; human nature

(责任编辑 于述胜)